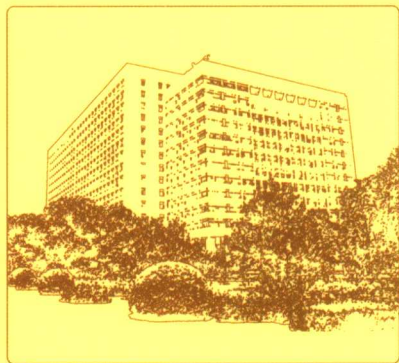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建院三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Dedicated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欧洲研究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建院三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Dedicated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欧洲研究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欧洲
研究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编. —北京: 经
济管理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207-846-8

I. 纪... II. 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欧
洲—研究—文集 IV. C53 D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2944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艳

技术编辑: 蒋 方

责任校对: 超 凡

787mm×1092mm/16

22.75 印张 368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书号: ISBN 978-7-80207-846-8/F·71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目 录

综合篇

论欧洲社会团结模式与欧盟发展战略	周 弘 (3)
论欧洲的联合与改	裘元伦 (16)
论欧洲共同体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条件	吴 弦 (25)
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	陈乐民 (39)

政治篇

法兰西民族的激进主义传统	马胜利 (51)
论德国当代政治文化若干特点	刘立群 (65)
布莱尔主义和新的“中左”运动	王振华 (77)
西方政治制度的分类与比较研究	杨祖功 (87)

经济篇

欧元前景析论	裘元伦 (101)
欧洲货币联盟启动后的不确定的因素	张健雄 (110)
欧盟经济政策结构评述	王 鹤 (119)
欧盟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与政策	吴 弦 (131)
欧盟中小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措施及启示	罗红波 (146)

法律篇

欧共体私法的协调与冲突法的发展	程卫东 (161)
试析英国议会主权原则与欧共体法最高效力原则 之间的冲突	李靖堃 (173)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宪法条约解析	傅 聪 (188)
-----------------------	-----------

社会文化篇

论欧洲联盟的社会政策	田德文 (201)
当代欧洲民族问题概观	邝 杨 (213)
战争、和平与“基督教共同体”	郭灵凤 (236)

国际关系篇

后“冷战”时期的中欧关系：观念转变与内生动力	吴白乙 (253)
论中欧关系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	周 弘 (274)
从亚欧会议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	张 浚 (287)
欧俄关系分析	张健雄 (301)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思考	潘琪昌 (315)
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德美关系	顾俊礼 (326)

学科建设篇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的欧洲研究问题	周 弘 (335)
欧洲学刍议	刘立群 (342)
论中国的“欧洲学”建设问题	沈雁南 (348)

编后语	(359)
-----------	-------

综合篇

论欧洲社会团结模式与欧盟发展战略

周 弘

2005年春夏之交,法国和荷兰相继在公投中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近年来一直向前快速滚动的欧洲一体化车轮遇到了重大障碍。欧洲不少媒体都认为,欧洲一体化建设面临着一场危机,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卢森堡首相容克说,“欧洲不是处于一种危机状态,而是处于一种深刻的危机状态”。^①究其根源,这场危机来自广大欧洲民众,特别是核心欧洲的民众对形势的不满和怀疑。他们经历了欧洲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正目睹欧洲经济与社会“完美和谐”成为明日黄花。在巴黎和伦敦,他们以数十年来最大的规模和热情走上街头,对雏形中的欧盟社会团结模式喊出了不信任的口号。

早在世纪之交,欧盟首脑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就欧盟发展战略达成协议,强调要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同时加大就业政策、经济改革和社会和谐力度。这份后来被称为《里斯本战略》或《里斯本议程》的欧盟世纪文件,为欧盟在21世纪头10年的发展提出了战略性目标:“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和谐。”^②

《里斯本战略》为欧盟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指导方针,以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关键词,调动了欧洲联盟的各种政治、财政和人力资源,启动了协调发展的新机器。要想了解这个战略对于欧盟发

① J.M.Thorn, “European Union in crisis after rejection of Constitution”, 28th June 2005. <http://euobserver.com>.

② Presidency Conclusions of the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in Maria João Rodrigues, *European Policies for a Knowledge Economy*, Appendix,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 2003.

展来说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还需要分析欧洲社会模式的发展逻辑和欧洲人解决难题的思维逻辑。本文将重点讨论欧洲社会模式与欧洲发展战略的关系,从而了解欧洲福利国家危机的性质、深度和前景。

一、欧洲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逻辑

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步骤:一是社会各界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和回应;二是民族国家的政府最终成为回应社会风险的主体;三是民族国家的政府使用行政和立法的手段制定社会政策、建立社会机制。至此,社会机制成为欧洲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早在大约 60 年前,卡尔·波兰尼就在《伟大的转折》一书中论证了在西欧国家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制度模式:市场经济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利用民主制度争取到了现代社会再分配制度,社会再分配制度补充了市场经济制度。反过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制约,而社会再分配制度又受到民主制度的制约。西欧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形成了一种自由(市场经济)、民主(选举制度)和团结(社会再分配)三者合一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出现和发展受益于两大历史背景:一个历史背景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工业社会的特殊风险和需求使国家机器的功能随之改变,从而开启了通过“国家战略”、“规划、预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时代。^①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与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彼此协调并相互制约,这就是卡尔·波兰尼在 1944 年所观察到的历史现象。^②

在整个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制约的制度在欧洲工业发达国家内普遍建立起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政策组合和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却又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政治选择。欧洲人把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这种共同特征叫做“社会团结”或“福利国家”。欧洲的福利国家以国家立法和国家行政为主要工具,对于经济和社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预,对市场分配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在市场经

^① Gunnar Myrdal,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Welfare Stat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60.

^②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acon Press, Boston, 1944.

济运行的过程中增加了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让市场经济的力量在社会团结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大量的分析认为,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曾经成功地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通过稳定社会而实现了政治制度的稳定。不仅如此,社会政策还通过再分配政策和社会保护制度引导了消费、减少了劳资冲突、提供了高技能和健康的劳动力,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社会政策曾经是欧洲政治和经济双稳定的条件。^①

在这个被称为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里,西欧的“繁荣、平等和充分就业似乎达成了完美的和谐”,西方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为“黄金治理”。^②但是这种模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那就是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经济主体、社会分配和民主选举都是以国家为边界的。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国家功能发展到了极致,政府利用行政和法律的工具有干预社会和经济,对个人和群体的利益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配置和组合。这种配置和组合因执政党的不同取向而有所不同。当然,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自由党人;无论是激进党还是保守派,都需要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他们不约而同地利用了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合一的机制,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增加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而自由党人则在不断地引进支持和培育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内容。他们的执政方针和政策都难以超越这个机制,都只是在这个机制模式中进行政策选择。结果是:西欧政治中出现了“中间化”的趋势和中左与中右交替掌握政权的规律。西欧的社会也从贫富悬殊、阶级斗争激化的“哑铃型社会”变成了中间阶层大、贫富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

在各派力量分头努力下形成的西欧国家形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结合体,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塑造了一种包含了各种利益的新的国民意识。而国家为了争取社会上各派选民对政府的支持,已经演变为试图满足各主

① Jens Alber, "Some Cause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1949-1977", in: Martin Loney, David Boswell & John Clarke (eds.),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Milton Keynes, Philadelphia, 1985, pp.156-170. Also: Michael O'Higgins, "Issues of Redistribution in State Welfare Spending", *Ibid.*, pp. 170-182.

② 《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二)——民族斗争,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进攻》,《明镜》1996年第40期《全球化》栏。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流派别利益的机器。各主流派别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向这部机器中添加符合自己利益的条款，也都能从这里找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种制度使得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限于资本和市场，众多的社会因素，如劳动者的权利、人口的素质、劳资关系、选民构成、政府政策等也成为促进或者制约增长的条件。

半个世纪以前，西欧的福利国家模式一度是美国和其他一些非欧洲工业国家的制度楷模。“伟大社会”的翻版远及各个大洲。但是，自从美国推行“里根主义”以来，“寻找新的世界机遇”和“扩大世界市场”就成为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为了“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民族展开竞争”，^①美国设计了“工作与责任法案”，以及一系列“为工作而福利”的方案。英国紧随其后，经“撒切尔主义”，将世界上的第一个“福利国家”改变成为“社会投资国家”。英国的社会观念也从个人争取政府的保护，转变为个人寻求“自主与自我发展”，政府的功能从提供经济援助改变为进行人力投资。^②

“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通过变革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变革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关系，又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变化进一步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关系。除了社会保险这个坚硬的内核变化较小以外，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领域有很多的政策方针都在发生着变化：国家在降低关税，同时降低公共开支和政府赤字；政府放松了对资本的约束，减少了对公民的保护，政府政策从援助个人转向支持资本，从普及性的福利发放转向有选择地针对低收入家庭，从实施系统性保护转向实施实用性保护，从政府与企业承担责任向个人与社区承担责任转变，从侧重向公民提供保护转向投资教育和培训。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软化了传统口号，自由的资本跨出了国界，缺乏保护的公民在谋求自我保护的过程中创造着新的机制，适应这种社会需求的金融保险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变化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愈显突出：日益增长的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传统的工会、政党以及

① 《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二）——民族斗争，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进攻》，《明镜》1996年第40期《全球化》栏。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2和132页。

与此相关联的国家功能面临着方式的转变。强大的工会政治压力随着个体就业的增加而削弱了。欧洲增长方式赖以生存的体制开始瓦解,“橄榄型”的社会重新开始向“哑铃型”退化,“福利国家正在变成竞争国家”。^①

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着两个命运选择:一是19世纪中叶英国“斯宾汉姆兰德制(Speenhamland)”的命运: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人口流动压力加剧,斯宾汉姆郡的居民被迫放弃了本地的社会再分配政策;二是重新认识时代的特征和挑战,用发展的眼光,面向未来的政策回答新时代的新挑战。欧洲人选择了后者,并且通过新的政治程序制定符合发展需要的社会政策。

二、欧洲式的思维逻辑

欧洲超国家体制的设计者让·莫内(Jean Monnet)曾经采用“扩大范围”(enlarging the context)和“求同存异”(building consensus)的方式,设计了欧洲式的谋安全、求发展的思路,这个思路同时也是欧洲社会解决劳资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思路之一。在民族国家内,欧洲人发明了“社会伙伴关系”。由来自劳方、资方和政府的代表就关系到三方利益的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就社会的共同利益取得认同,社会的发展战略因此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是经济赖以发展,政治能够运行的依托——这就是欧洲式的思维逻辑。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外,而利益的相关者并没有随着这一变化而获得参与超越疆界的社会战略制定的过程,他们当然也难以就社会价值达成认同。相反,民族国家层面上的社会战略制定者难以就超出他们权限范围的问题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外部力量超出了内部的协调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的“社会团结”模式就出现了漏洞。因此,只有扩大“社会团结”的规模,提高“社会团结”的层次,建立适应更大规模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团结”模式,才有可能适应经济规模的发展。

在欧洲,所谓扩大范围和规模,是指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内制定适合全欧洲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所谓提高水平和层次,是指由超出民族福利国家之上的政治程序来决定应对新的社会风险的战略方针。在民族国家的政

^① Jens Alber, op.cit., pp. 100-101.

府继续受到国内政党政治羁绊的时候,欧洲联盟的政府——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就要承担,或部分地承担这项政治和社会使命。

整合欧洲联盟的社会团结模式有一个成熟的条件:在西欧大陆上,由于共同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的作用,欧洲国家不再以单个国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是组成共同市场,使用单一货币,实施一系列超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形成了一整套超国家的经济制度体系。这套经济制度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政策的配套措施。

欧洲联盟的制度体系和它的成员国不同,它不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完美“合一”,而是三者不对称的体系。欧洲联盟的经济一体化速度远远超过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在欧洲联盟的制度框架中,经济近乎于统一体,而由于“民主赤字”的原因,在欧盟层面上一都缺乏建立统一的社会机制的压力。^①由于这个原因,在经济领域里,市场竞争规则在欧盟范围内起着主导作用。在政治领域里,政党主要在民族国家内活动,影响国家的社会政策。由于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许多权力已经让渡给了欧盟,所以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手段也受到了限制。单一货币的问世还使欧元区成员国在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率等方面制定政策的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一直到前不久,欧洲社会民主党才意识到,由于民族福利国家已经向欧洲联盟让渡了经济政策自主权,所以政治活动的压力如果继续施加给民族国家,将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开始从否定欧洲一体化发展到积极地在欧盟层面组织活动。^②一体化的经济最终还是对分散化的政治产生了影响,虽然政治和社会一体化的道路漫漫修远。

总而言之,欧洲传统的增长模式是一种以国家为整体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首先受到全球性竞争的挑战,后来又受到日趋自由化的欧洲大市场的考验,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从观念到体制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当前欧洲的社会现实是由欧洲联盟和成员国的双层体制构成的。欧洲人既想在欧盟的层面上“继续建设单一市场,并促进经济自由化”,又想依靠民族国家“保存”“高度发展的福利制度”。^③结果,不是大市场的经

① Philippe Pochet & Bart Vanherche (eds.), *Social Challenge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uropean Interuniversity Press, Brussels: 1998, pp. 20-21.

② David J. Bailey, "Obfusca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Legitimizing 'New'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JCMS* 2005 Volume 43, Number 1, pp.13-35.

③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就职演说, www.europa.eu.int.

济力量逼迫成员国不断地进行改革,就是成员国利用政治力量阻止大市场过快地发展。更准确地说,因为成员国的制度和政策体现了公民当前的权利和义务,而欧盟的制度和政策则代表了市场的力量,所以成员国的公民就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制约市场的力量,甚至去阻止欧盟大市场和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为数众多的法国人和荷兰人在公投中反对欧盟宪法条约,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体现。

欧洲模式以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和政治普选制影响着欧洲大厦建设者们的思想和行动,使他们不断地反省欧洲联盟的整体战略和制度模式,不断地在欧盟层面上出台新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具体的政策指令,从制定社会救助方面的共同标准,发展到在欧盟层面上协调发展目标和政策,^①继而为跨国雇佣和跨国社会保障金的发放规定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②欧洲民族国家的社会模式阻止了欧洲联盟层面上“市场社会化”的发展。^③欧盟的制度模式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逐步地引入欧洲传统的社会公平观念和社会团结模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欧洲灵魂”(普罗迪语),使“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命运”向着适应世界经济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以欧洲整体的力量来促进“福利国家的现代化”,同时又以欧洲整体的力量来突出欧洲的社会特性,“用新的做法表示社会团结和对他人的责任,而不是把纯粹的个人利益完全作为经济活动的动机”。^④

但是这种理想的欧洲模式和欧洲社会现实之间还横亘着巨大的障碍。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规则顽强地抵抗着大市场的自由竞争规则。大市场越是成功,民族国家的危机就越是沉重。2005年,欧盟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是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扩大的欧盟大市场使得资源有了重新配置的场所。但是,这种配置却难以改变欧盟核心成员国经济长期疲软的困境。在这些国家实现增长,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需要发展环境技术,需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依赖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通力配合。然而,欧盟只提供了在经济领域里竞争与协调的机制,这固然有利于资产的优化和欧洲市场的未来发展,但是

① 92/442/EEC, OJ L 245 26.08.92 p.49.

② OJ C 125 06.05.99 p.1.

③ 《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共同声明》,载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第36页。

④ 布莱尔和施罗德声明,社会党人“支持的是市场经济,而非市场社会”。同上书,第41页。

也难免在成员国之间产生“社会倾销”，动摇目前欧洲模式已经十分脆弱的平衡。

三、欧盟的发展战略

欧洲联盟没有就增长相对于公平的优先性，或者公平相对于增长的重要性做出简单的判断，而是根据经济未来的发展走向，从提高竞争力、保持社会和谐和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等多个角度出发，制定共同发展的平衡发展战略。

欧盟发展战略的第一要义是分析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经济全球化对欧洲社会模式的冲击，最主要地表现在产业信息化上。根据欧盟专家的评估，欧盟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将为欧盟公民带来大量高收入的就业机会，而目前在知识经济领域里，美国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确定经济发展的走向，推动整个社会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好准备，这不仅是经济发展战略，更是社会发展战略。从欧洲社会的第一大难题——失业率过高来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失业保险的慷慨与否，公平和效率孰轻孰重，而在于社会政策的结构和内容没有根据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调整。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失业大军和高科技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存在。因此，知识不足就成为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风险之一，它就像在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疾病风险、工伤风险一样，可以造成劳动者脱离劳动市场，甚至落入贫困的深渊。社会政策必须回应时代的这一新挑战。

欧洲社会的另外一大难题是老龄化和养老基金难以为继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两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一是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二是需要增加妇女就业，使妇女由丈夫社会保险待遇的享受者变为缴纳社会保险税费的劳动者。如果从国家行政和政党政治的角度去解决这些社会政策问题，就很容易因为社会政策受益者的政治力量过于强大而导致搁浅。但是如果从产业转型和知识经济的角度去分析，在这个领域里调整政策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根据劳动的强度确定的，知识经济以其弹性工作时间和低劳动强度而使劳动者的可劳动年限加长。此外，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劳动者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这样就使就业年龄推迟，相应的也应当推迟退休年龄。灵活就业同样适用于有家累的妇女。从如上的分析来看，妨碍老人和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并获得较高报酬的“瓶颈”仍然是

知识和技能的匮乏。

在社会政策中突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和培训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即通过政策干预,或通过投资社会而使公民获得能力,并为经济的未来发展准备必需的人力资源。这不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舍,而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基于上述分析,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是“每个公民必须具备在知识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技术。”^①

里斯本欧盟发展战略的另外一个要点是战略本身的可操作性和可落实性。如前所述,欧盟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而社会团结模式却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这里的鸿沟只能由欧洲联盟的机构来填补。鉴于欧洲联盟的机构授权有限,里斯本首脑会议就提出了一种以“开放性协商方式”(Open-Method-of-Coordination)为主的社会标准化机制,在尊重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协商、统一目标和统计方式,让成员国以各自的资源、特色和方式去实现共同的目标,从而加强欧洲联盟的一致性。

《里斯本战略》代表了欧盟发展的未来:它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提出创造欧洲的信息社会、建立一个欧洲的创新、研究和发展区;它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提议采取自由化措施,推行国家援助和竞争政策,改进企业经营环境;它顺应市场的发展,要求在电信、公用设施和交通方面建立网络工业,建立欧洲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它照顾民众的福祉,强调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劳动技能,使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加强可持续性发展。《里斯本战略》的设计者甚至看到了在欧盟多国双层体制内实施欧盟政策的困难,提出了通过“开放性协商”的方式,让所有的成员国都提出自己的议题和意见,把争端摊到桌面上来进行公开的辩论,在“开放性”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讨价还价,确定代表成员国意志和共识的共同标准,进而统一统计标准,交流实施计划,获得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认同,包容差别、搁置争议,建立信息互换和意见沟通渠道,产生相互影响和制约。

至此,欧洲社会团结的历史逻辑已经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和新的生活场景下部分地完成了它的新生: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方式的未来进行了

^① Presidency Conclusions of the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in Maria João Rodrigues, *European Policies for a Knowledge Economy*, Appendix,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 2003.

评估后，一个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风险承担主体：欧盟机构和它的成员国的合作机制已经就位，新的工作程序和机制也已见雏形。新的欧盟发展战略绝不是“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竞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欧洲的特性和欧洲的利益。

然而，五年过去了，雄心勃勃的《里斯本战略》没有给欧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显著的变化。《里斯本战略》预计到2010年欧盟经济增长3%，但是时间过半，增长率却不及预期的一半，其他指标也令人沮丧。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欧盟的平均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人均GDP徘徊在美国的70%左右，欧盟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美国。^①《里斯本战略》没有给欧盟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带来喜人的变化。在1996~2003年期间，欧盟15国的年均生产率增长为1.4%，而美国则达到了2.2%。美国在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领域里遥遥领先，而欧洲人则将大量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一些传统就业随着产业的转型而流失，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却在持续减少。欧盟制定的经济指标难以实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制定和修改繁杂的劳工保护法和详尽的社会政策目标的权力仍然保留在成员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坐拥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各个成员国依然我行我素，它们的领导人要保持执政的地位，首先要向国内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向欧盟的未来负责；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各个福利国家的民众难以理解他们的领导人和精英们为欧洲发展的未来所作的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努力，当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就用在国内民主制度中获得的权利，集体走上街头，把压力施加到民族国家政府头上。

从欧盟的层面上看，2000年的《里斯本战略》虽然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却使增长和就业的议题进入了欧盟的评估程序。欧盟可以根据《里斯本战略》提出的目标和指标，评估欧盟和成员国的工作成绩，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一个审议《里斯本战略》实施进展的高级评估小组发现，欧盟整体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投入不足，只有两个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超过了GDP的3%，只有5个国家将欧盟关于内部市场的指令转化为成员国指令。但他们还发现，欧盟的扩大加剧了推行《里斯本战略》的难度。统一大市场的扩大虽然给新入盟的国家创造了产

① André Sapir, "An Agenda For A Growing Europe, Making the EU Economic System Deliver", European Commission, July 2003.